

凭窗读史



袁同礼先生。

从谜团到水落石出

《永乐大典》被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称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如今存世的400余册较原来的11095册,不仅微乎其微,而且只有副本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嘉靖副本《永乐大典》(简称《大典》)62册,统一编号为“平图013150-013211”。“平图”二字表明,它们属于国立北平图书馆(简称平馆)。

与大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不同,它们不是在1949年仓皇运到台湾的,而是在1965年,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启程,漂洋过海而来。

与之同行的,还有平馆善本甲库中的2万余册精品。甲库,是民国时期典藏宋元明早期善本的书库。上承清内閣大库旧藏,又广纳清末民国几代学人潜心搜罗的善本,其中宋刻元刊荟萃,珍贵稿本云集。从甲库中再精选出来的这2万多册古籍,价值非凡,却背井离乡栖身美国,又从美国到台湾,至今仍未有归期。

如果把这些嘉靖朝抄写的《大典》想象成一群400多岁的老人,那在上海的历险,一定是他们闲话平生时爱聊的话题:“孤岛”藏身,敢特追寻,提心吊胆闯海关,悲情满怀渡重洋……唉!虽然没回北京,但能存于天地间,已是万幸。

如今,那些抗战时期的护书人早已作古,但随着史料发掘,曲折的情节逐渐浮现。2024年7月,雷强博士竭十年之力搜集整理的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出版,让2800多件手札、档案初次披露,护书行动中的“中枢人物”袁同礼,也重新回到了人们视线中。

袁同礼曾参与故宫博物院和平馆筹建,在敦煌学发轫,故宫文物南迁,平馆善本南迁和运美,《永乐大典》海外寻踪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,都是关键人物。他与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胡适等名家,及伯希和、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都交往频繁,但却是“五四”群星中常被忽视的一位。

“袁同礼对国图的影响,就相当于蔡元培之于北大。”雷强在国图做展览和善本阅览工作时发现,“虽然在各种活动中,人们常常谈起他,但大多不明就里,泛泛之言”,因而发愿撰写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。

十年“慢功夫”,书稿无一日不辍于心中、浮于脑海,让他身心俱疲,目力、腰背皆疲,近于溃败边缘。好在他耐力非凡,于嘈杂、繁乱的工作间隙,完成了对大量中、英、法文史料的收集和梳理,成稿厚厚五本书。

随着袁同礼在文献中鲜活起来,

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《永乐大典》224册,其中有62册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和这些古籍一起暂存台北的,还有国立北平图书馆(国图前身)善本甲库中的2万余册精品,它们大多是

大内秘藏、海内外孤本,却被送上了横跨太平洋的游轮,远渡美国。

从战火中上海滩一别,这些善本离馆已八十余年。天津街7号,如今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是它们的家,然而在琳琅书库内,只剩下缩微胶片。

随着古籍数字化,一张张“游子”照片,已经化身千万。但端详照片上的藏书章,仍不免五味杂陈:送走这些古籍时,它们命悬一线,如今天下太平,却不知何时能归故里。

善本漂泊

——平馆甲库珍藏古籍避难记(上)

孙文晖



国立北平图书馆正门。



1929年5月11日,北平北海图书馆举行馆舍奠基仪式。

102箱善本运到美国的故事,也愈发振聋发聩:

抗战期间,平馆为躲避侵华日军战火洗劫,将部分珍藏南运,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部分珍品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。整个过程历时近十年,迁徙万里,远赴海外,异常艰辛。

遗憾的是,一直以来,这段历史史料不多,存疑不少。很长一段时间,由于此事极机密,参与者大多没留下完整回忆,因此背景、细节一直扑朔迷离,甚至以讹传讹。

“故宫文物南迁留下了大量图片资料,但平馆善本南迁过程,却只有一张图片存世。这还是在善本到达美国之后,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报道的。对于平馆来说,这是一场保护古籍的‘硬仗’,但由于在保密情况下进行,在大陆没有留下一张照片,也没有一篇公开的报道。”时任国图展览部主任的林世田曾在十年前的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馆藏文献展”中,对此深表遗憾。

这次,随着袁家提供的书信以及众多海内外档案披露,袁同礼、胡适等核心骨干,在乱世中殚精竭虑,几乎发疯的心路历程终于有了完整复盘。

“有些人对善本送到美国的事颇有怨言”,雷强动容道,“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,我看到的是时局的步步紧逼,一个个按照常理做出的最好选择,其过程是动人心魄又伏脉千里,了解越多越能同情理解。”

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,这个故事终于可以徐徐展开了。

从藏书楼到图书馆

存在台湾的62册《大典》,大多盖着两个藏书章——“乾隆御览之宝”和“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”。从大内到民间,从藏书楼到图书馆,是它们保存历程的关键一步,也是心惊肉跳的一幕。

这部本应藏于紫禁城的书,能进入图书馆,源自清末重臣张之洞的一个心愿。

清宣统元年(1909年),军机大臣张之洞兼管学部时,奏请移交包括残存《大典》在内的翰林院藏书,作为创建京师图书馆的基础。

从他的奏章可以看出,翰林院敬一堂所藏《大典》在乾隆时已残缺不全。光绪元年(1875年)修缮翰林院时,所存已不足5000册。

八国联军进北京(1900年)时,翰林院成为战场,仅存的800余册竟被当作防御工事的砖头,随手抓起的挡箭牌。战火焚毁,再加上人为抢劫,几乎化为乌有。

次年,英国驻华使馆归还了330余册,却被监守自盗的守门、衙役等瓜分。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下令追回

的64册,就是张之洞所说的清廷残存了。张之洞有所不知的是,这位标榜寡欲的状元,竟把收上来的书都搬到了自家宅院。

清末民初,兵荒马乱,陆润庠本以

为没人“管闲事”,哪想到,自己碰上了

同样爱书如命的“刺头”鲁迅。

北洋政府成立后,“学部”蜕变成“教育部”,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,主管图书馆、博物馆事务。从1912年到1926年间,《鲁迅日记》中有关图书馆的记载,共有941次,内容涉及馆址的选择与调整、藏书扩充、业务开展等。

最让鲁迅费心的是京师图书馆,该馆的一把手虽然是他上司曹汝斤,但夏曾佑是个“甩手掌柜”。《鲁迅日记》说,“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,头脑岑岑然”。

听说陆润庠保存了部分《大典》,鲁迅便托人带口信,以教育部的名义请他交还国家。那时陆润庠已经年过古稀,只是搪塞过去。鲁迅又多次登门,表面上有事相求,其实是软磨硬泡。

陆润庠拗不过,终于交出64册《大典》,其中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,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。张之洞在清末许下的心愿,这才达成。

一来二去,鲁迅与陆润庠还成了忘年交,他在杂文和书信中多次提及陆润庠,均含敬意。在鲁迅笔下,陆润庠不是一个暮气沉沉的政客,而是一位颇具黑色幽默感、痛恨国民劣根性的漫画家。

1915年,教育部下令,必须在善本书籍上“盖印编号”,同时下发了“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”石质印章一方。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《大典》中,35册铃有此四角略带点椭圆的长方印,应该就是首批入藏图书馆的《大典》。

《大典》以音韵分目,针对某“字”,

罕见完整卷数,连续连卷之书更是少见。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“八灰”册,卷2808—2813,“梅字”3册,以及“九真”册,卷2948—2955,“神”字4册,却是少见的连卷。

从中间可以看出,台湾所藏是现存《大典》中的精品。

从陋室到远东第一

60册《大典》入藏京师图书馆,却没享受到“镇馆之宝”的待遇。

当时坐落于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地址偏僻,馆舍凋敝,但宝贝可真不少。《大典》与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、内閣大库里的《明实录》、敦煌遗书等古籍挤在一起,根本没有开放展览、用于研究的机会。

北洋政府后期,军阀混战,文化事业是最早被“断供”的。

1926夏,梁启超被聘为京师图书馆馆长,却无半分经费。到冬天,馆中无煤生火,无纸糊窗,冷风飕飕如冰窖。梁启超不忍员工受冻,更不忍国家典籍散失,就将自己的五万元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抵押借款,用来发薪、生火、糊纸。据不完全统计,梁启超前后垫付经费达一万多元,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费用。

即便经费紧张,梁启超仍希望能扩充馆藏。从一封信中,就能看出他的急切心情。

1926年7月,梁启超在给予李四光、袁同礼的信中,特别提到日本人对京师图书馆馆藏虎视眈眈:“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耽耽于方家旧籍,吾信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,两公谓何如?”

1920年代,已有大量日本人来中国收购古籍,京师图书馆的善本最多,日本人自然虎视眈眈。另一方面,作为国家图书馆,对中华文献要尽全力去收集购买,因而要“急起直追”。



《永乐大典》卷19735。

他的苦心经营终究没有白费。1929年8月,按照他生前的建议,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(简称中基会)用美国庚款退赔款全力支持平馆的现代化转型,包括新建馆舍、购买图书等。

两年后,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在北海边落成(即现在的国图古籍馆)。它的外表是官殿式的,有绿琉璃瓦殿顶和汉白玉栏杆,门前还搬来了圆明园的狮子看门,安佑宫的华表镇院;内部则是一流的公共空间,有钢铁书架、暖气炉、通风机、发电机、卫生设施等。新馆从设计到建造,资金全都来自中基会,花费130万银圆,硬件配置是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,在世界上也算一流。

为祝贺新馆开馆,美国英格利夫妇捐赠《大典》卷8091—8093“城”字册。此时,《大典》的保存环境有了极大改善,就连善本地库的钢筋都是从英国定制的。

1931年6月25日,国内外两千余代表参加了新馆落成仪式。馆长虽为蔡元培,但他长期不在北平,馆务几乎都由37岁的袁同礼主持,致答词的也是他。

早在1920年,蔡元培就亲自选定袁同礼出国,学图书馆学,并认定他将来可堪大任。别看袁同礼留美时间不长,但是他勤走勤看,广交朋友,显示出极强的人际交往、沟通能力。多年后,季羨林还在回忆中,称他为北平的“外交部长”,同班同学傅斯年则用了sociability(交际广)一词来形容他。

从1924年袁同礼回国,到1937年北平沦陷,只有短短的13年,这也是平馆发展的黄金期。馆内大小事,他都事必躬亲,网罗人才更是不遗余力。

最重要的是,他有“通中外图书之邮”的能力。《年谱》中收有数以百计袁同礼与国际同行的英文往来信件。1934年,他赴多国访问,与各大大学、图书馆进一步确立出版品交换业务,平馆成为当时东亚最为重要的学术、文化机构之一。

主持平馆之外,袁同礼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调查《大典》存世情况的“第一人”。

从留学开始,他历时15年,足迹遍及欧美,对流散在国外的《大典》进行调查、收集、复制。至1933年,他已证实中外所藏《大典》349册,出版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》,将卷数、页数、韵目、内容和藏地等都做了详细表格。他还派优秀馆员王重民等,到欧美汉学家身边邸底,以便让不能收回的古籍,影像先回家。

外孙女袁书菲说:“外祖父对记录海外的古籍善本、艺术品和文物的兴趣,源于他的一个愿望——那就是当中国有一天有能力要求各国返还这些古物时,他所编辑的相关目录能在谈判过程中起作用。”

袁同礼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,对《大典》的流散状况又了如指掌,自然能四处征集,广为搜罗。到1934年,平馆所藏《大典》数量已达93册。

一时之间,平馆善本藏品之精,数量之丰,冠于全国。1931年6月新馆开馆之初,袁同礼曾说,“欲为中国文化之宝库,作中外学术之重镇”,照此势头发展下去,平馆本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图书馆,但仅半年光景,这一宏愿便被时局打得稀碎。

从国殇到古籍南迁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没几个月,日本人把矛头指向上海。

1931年12月8日,闸北的商务印书馆,当头迎来6枚上百公斤的炮弹。第一枚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,瞬间,那些被熔化了

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。第二天,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(今涵芬楼前身)纵火,全部藏书化为灰烬,纸灰没膝,标志性的“五层大楼成了空壳”。

最令人痛惜的是,这座号称“远东第一,世界第三”的私人图书馆,藏书46万册,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,共35000多册;其中还有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,共25000册。

大火将东方图书馆吞噬后,余火数周不息。住在10多公里外的老上海回

忆说:“当年图书馆的烟灰飘在家里阳台上,整整一个礼拜!”

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,看着满天飞灰,呜咽着说:“这是我的罪过!如果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,不是集中保存,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,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!”

郑振铎曾在《劫中得书记》序言,描写了十年藏书一朝被焚的痛苦,他写道:

“没有烧干净的焦黑纸片,漫天飞舞,就像是墨色的蝴蝶。几十上百片地随风飘坠到庭院里面,拿手捡起来,还有一点余温,隐隐约约得到上面的字迹。这些可都是古人的文赋啊,我的收藏竟然跟着一起‘蝶化’了。”

所谓“蝶化”,出自《庄子》的典故,万千爱书人的心痛,用在这里,再贴切不过了。

这场浩劫也让国人明白了,日本人不仅要夺取中国的国土,更要消灭中国的文化。日军侵沪司令更是在“一二八”事变后得意扬扬地说:“烧毁闸北几条街,一年半就可恢复,只有把商务印书馆、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,它则永远不能恢复……”

从此,一场文化自救,一场书籍与炮火的赛跑,悄然展开。袁同礼抛下建设“世界一流图书馆”的梦想,转而把维护文明命脉作为头等大事。

1933年1月12日,北平城里积雪初融,分外寒冷。四合院里,气氛更是凝重,平馆委员会,包括主席胡适,副馆长袁同礼,委员长陈垣和委员傅斯年、刘半农、任鸿隽正在召开秘密会议。

就在同一天,日军攻占长城要隘九门口,北平告急。三个月前,故宫博物院古物已经开始打包准备南运,平馆珍藏如何保全,也得有个决断。

最珍贵的典籍要不要南迁?这个提议,很快被否决了。

一来,南方气候潮湿,不利于保存。二来,路途遥远,容易发生意外。况且,还有些委员担心“南迁代表放弃北平,会动摇抗战信心”,拿不定主意。

最终,做了个折中的决定:善本就

近转移到北平周边有国际背景的机构,顾忌着国际关系,日军总不好动手。从1月13日到5月23日,平馆挑选藏书,总计封装233箱,分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、北平德华银行及北平协和华语学校三处寄存。

每个装书的箱子都是松木钉制,厚实又耐磨。工作人员还为每本书都裹上蜡纸,用来隔绝潮气,封盖前也会塞入药物,防止虫蛀鼠啃。为了方便整理,工作人员根据《千字文》顺序,对这些木箱进行编号,书籍封条,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外,还必须有胡适、任鸿隽、袁同礼的签名。《大典》有专门的蓝色书套、书盒,书签上,那清秀的毛笔字,是老馆员陈思惠的笔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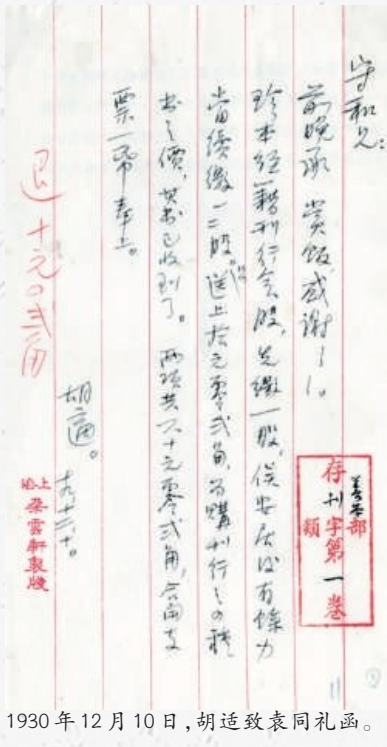
安顿好两年,平馆又接到国民政府急电,令他们将馆藏的古籍善本,“以极机密之方法,择要转存南方,以策安全”。《大典》不得不踏上颠沛流离的旅程。此次的目的地只剩下上海和南京可选。尤其是上海,可以用租界作掩护,躲避搜查。

平馆虽然名义上是政府和中基会合办,但经费全靠中基会提供,而中基会提供的经费中,并无搬家费一项,全馆员工只得一起上船,把586个大箱子搬到正阳门火车站,分批南运。

其中有197箱甲库(清以前)善本、107箱乙库(清以后)善本、49箱唐人写经、15箱内閣大库舆图、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、116箱西文整理科学杂志、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。

搬过家的想必都知道,书籍压分量,最难搬运。这次古籍大转移,国民政府未派一兵一卒,一切皆由平馆员工秘密进行。全面抗战爆发前,能将《大典》等善本,存于上海公共租界,将内閣大库舆图等,存于南京地质调查所,已经是天费周折了。

卢沟桥事变后,平馆人员一路南迁,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昆明、香港等地均有办事处。袁同礼的女儿袁静上过十余所不同的学校,当她问母亲为什么要经常搬家时,母亲说:“我们跟着书走。”



1930年12月10日,胡适致袁同礼函。